

## 叶燮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研究述评

南 华

(西北大学 文学院, 陕西 西安 710069)

**摘 要:**300年来,学者们对于叶燮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的研究,可分为四个阶段:清初、民国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、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。这些研究有发展,有进步,不能一概否定。学者们对于《原诗》诗本体论的理论性质的认识,存在重大分歧,对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研究方法,是反儒还是归儒,历史地位如何,以及《原诗》的成书时间等,也存有争议,本文分别对它们作了述评。

**关键词:**诗学;诗学思想;诗本论

**中图分类号:**I206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2731(2002)04-0126-05

叶燮(1627—1703)是中国诗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。他的《原诗》将诗从文中独立出来,进行专门而深入地讨论,并由此在事实上形成了他的诗学思想体系。到20世纪后半叶,随着中国诗学的发展,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学人所认识,研究《原诗》诗学思想成为诗学界的重要问题,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。明年是叶燮去世300周年,回顾并总结这些研究成果,对于我们在300年后更好地理解《原诗》诗学思想,发展21世纪中国诗学无疑是有意义的。

## 一、《原诗》研究的四个阶段

大体看,《原诗》诗学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为清代。《原诗》甫问世即受到关注。与朱彝尊合编《词综》的汪森当年就读到它[1](卷三《读已畦原诗一编用昌黎醉赠张秘书韵有赠》)。叶燮的学友沈衍则为《原诗》作序,他在序中肯定《原诗》“创辟其识,综贯成一家言”,“出以砭其迷,开其悟。”叶燮的弟子沈德潜、薛雪也颇多承袭叶燮的诗学思想。然而《原诗》问世后,流传并不广,据《重刻〈已畦集〉书后》所言,很长时间内《原诗》甚至“若存若亡”,没有受到诗学界应有关注。《四库提要》则严词批评《原诗》“极纵横博辩之致,是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”,“词胜于意,亦多英雄欺人之语”。[2](卷一七九集部诗文评

类存目)此后《原诗》遂湮没于众多诗话中。

民国时期为《原诗》研究第二阶段。但30年代及以前,《原诗》仍处于被忽略状态。如陈中凡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没有为叶燮安排专章论述,却对叶燮的文章诤友汪琬及叶燮的弟子沈德潜有专章论述,但在这些论述中,竟没有提及叶燮。40年代以后,从科学角度研究叶燮及《原诗》的诗学思想,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。如朱东润先生的《中国文学史批评大纲》,以数千字论述《原诗》,虽篇幅所限,未遑深入,但研究《原诗》的视角和方法均属前所未有的。朱先生的研究,开启了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研究的新纪元。郭绍虞先生1947年问世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·下》为《原诗》正名,认为《四库提要》非难《原诗》可谓大误[3],(下卷P492)该评论得到后人一致赞同。他对《原诗》分五目作了系统揭示,其研究成果可谓集民国时代《原诗》研究之大成,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成果,值得充分重视。

第三阶段可以六、七十年代为代表。在这一时期,叶燮及《原诗》的文献学、美学思想研究进入新阶段。霍松林先生以《清诗话》作底本,据《已畦集》本校勘《原诗》,写毕于1964年,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,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。霍先生为《原诗》校勘本作的《前言》,对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的哲学性质作了深入探讨。

收稿日期:2002-02-08

作者简介:南 华(1973-),女,陕西礼泉县人,西北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专业硕士生,主要从事中国诗学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。

第四阶段指改革开放后,研究逐渐进入繁盛时期,国内几乎各家古典文学史、文学批评史、美学史都以《原诗》作为叶燮诗学思想的代表,给予足够关注。80年代有叶朗先生的《中国美学史大纲》;论文有蒋凡先生的《叶燮〈原诗〉的理论特色及其贡献》等。进入90年代后,成果迭出,如敏泽先生的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》、庄严、章铸先生的《中国诗歌美学史》、张少康、刘三富先生的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》、陈良运先生的《中国诗学批评史》、王运熙、顾运生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、萧华荣先生的《中国诗学思想史》、张健先生的《清代诗学思想研究》等,都把叶燮及《原诗》作为自己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。该阶段代表性论文有陈长义先生的《试论叶燮的理性美学观》、王绍龄先生的《叶燮〈原诗〉新论》、卜松山、王文兵先生的《论叶燮的〈原诗〉及其诗歌理论》等。21世纪有李世英先生的《清初诗学思想研究》、蒋寅先生的《叶燮的文学史观》等。

八、九十年代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辉煌的,期间不仅研究者众,成果丰硕,且研究专门化、系统化。如《原诗》的诗本论研究、创作论研究、美学思想研究等。步入21世纪,《原诗》的诗学研究出现转向苗头,从大的文化史背景看待诗论,成为学者更喜欢的话语。这与诗学界“文化诗学”的兴起,当不无关联。

敏泽先生在他1993年版的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》中认为,“五四”以后直至解放以后的40年来,对叶燮及其《原诗》“都不曾作出应有的公正的评价”[4](P1122)。他对学界在90年代以前关于叶燮《原诗》诗学研究史基本上是否定的。那么,他的否定对不对呢?

叶燮去世近300年中,真正对《原诗》诗学思想作科学研究,从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,迄今不过50多年。如除去文革10年干扰,真正的诗学研究也只有40多年。在这有限的40多年研究历史里,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很大的,不能全部否定。期间研究人数增加,取得成果众多,研究的视角多样,研究方法科学。仅从研究视角看,或从美学角度、或从文学角度、或从诗学角度来进行分别研究。值得注意的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更多的学者从诗学角度来讨论《原诗》的诗学思想,即使讨论《原诗》的美学思想或文学思想,也是讨论其诗歌美学思想或诗歌文学思想。这表明学者们在研究中越来越突出《原诗》的诗学性质,越来越围绕《原诗》的诗学思想进行研究,越来越按照《原诗》思想的本来面目进行如实研究。这从一个

侧面表明,对《原诗》的研究水平在逐渐提高。

其次,不论是40年代的学者,还是90年代的学者,对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的认识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。比如,关于叶燮的生平、个性、《原诗》的版本、流传及历史背景、《原诗》的诗史观、《原诗》的创作论对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与“才”、“识”、“胆”、“力”的重视等,学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争议。这些共识为进一步研究《原诗》诗学思想准备了很好的基础。

同时,对某些重要问题,学者之间仍存在着重大分歧,如对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的理论性质,特别是《原诗》诗本体的哲学性质等问题。这些分歧恰恰正是后来治《原诗》的学者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所在。

## 二、《原诗》诗本论理论性质的分歧

《原诗》中,叶燮以“踵事增华”与“地之生木”的精彩比喻来说明诗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。事实上《原诗》的整个理论体系也着实呈现出开放性。随着学人理论视域的不断开阔,对《原诗》的阐释也处于生生不息的动态之中。今天,我们恰可以此二喻来形容近年来《原诗》研究的发展状况。下面笔者拟就学者们对《原诗》诗本论的认识予以综述。

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们已经提出《原诗》诗本论问题,并揭示了《原诗》诗本论的形式系统。朱东润先生说,“横山论诗非就诗以求诗者也,此言与虞山诗外有诗亦合。”[5](P276)朱东润先生已经注意到《原诗》论诗,在现象的诗之外,力求论诗之本体即诗外之诗。郭绍虞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不惜笔墨描述《原诗》思想达五目之多,篇幅超过对于王夫之、王士禛的论述,他对叶燮及《原诗》的重视及研究是全面细致而深入的。郭先生首次揭示了《原诗》诗本论的形式系统,并将这形式系统首次用图形表示出来,令人一目了然。他认为,“本”,实在是横山诗教的根本,是横山诗教的基本观念,是横山诗教最为精彩的理论。在物者,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即是诗之本,表现为诗道;在人者“才”、“识”、“胆”、“力”是诗人之本,表现为诗志。离开这两“本”,诗必会流于摹拟剽窃。由这诗之本、诗人之本,于是再推到作诗之本,在物者是触兴,在我者是胸襟。作诗之本虽有在物在我之分,然而中间由“气”相联系,“气”之具体成形者,即为辞,从而成诗。[3](下卷P498)因此,我们似乎可以确定,郭先生认为《原诗》的诗本论就是在物者之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与在人者之“才”、“识”、“胆”、“力”之结合。在物者可谓客体,在人者可谓主体,则《原诗》诗本论就是主客统一论。郭先生论《原诗》思想,

“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，……总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此的缘故”[3](上卷P2)。他确实平心静气地分析了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结构，描画了《原诗》诗本论结构图，但没有作批评，甚至没有“主客统一”的结论。他画的图式中，用箭头符号所表示的正是这种统一进程。所以我们似可将郭先生划为“主客统一派”。

和郭绍虞先生不同，霍松林先生认为《原诗》哲学思想“接近唯物主义艺术本源论”。霍先生在为《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碎语》作的《前言》中，系统论述了这一观点。他认为，《原诗》的命名，标明了叶燮的著书宗旨。他不是“就诗论诗”，而是力求推究诗歌创作的本原，解决诗歌创作根本性问题。他认为叶氏的诗本论迂回批驳了“温柔敦厚、忠厚和平”的封建诗教，认为文章表天地万物的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的说法接近唯物主义艺术本源论，但究竟太宽泛，且不能把这一艺术本源论坚持到底。在方法上叶氏也接近唯物主义反映论，因为叶燮认为，文章者“克肖自然”之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，“为至文以立极”。关于反映什么，前后七子属正统派的“诗以道性情”，执拗僵化以“温柔敦厚”、“忠厚和平”为诗之体。而公安、竟陵则主独抒性灵，抛却“万古之性情”，重“一时之性情”。二者之失正在于“不知诗反映什么，如何反映”。叶朗先生以近两万字，推《原诗》为代表，细致阐释叶燮的美学思想体系，详细发挥了霍先生“接近唯物主义艺术本源论”之说。他认为，叶燮的美学体系中的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说包含有艺术本源论和美论(关于现实美的理论)。宇宙万物本体是“气”，“气”的流动就有了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。“气”的流动也就是美。所以现实美与客观的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是统一的。任何艺术作品都是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的反映，也可以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是现实美(天地自然之文章)的反映。这是十分鲜明的唯物主义艺术本源论，是叶燮全部美学的基石。[6](P488)90年代阳晓儒《叶燮的美学思想》一文关于诗本论的讨论与叶朗契合。

霍、叶关于《原诗》思想理论性质的论断，是从美学思想的哲学性质角度作出的，和郭绍虞就诗论诗之本不同。因为诗学思想是美学思想的表现，霍、叶的论断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推论：即《原诗》美学思想接近唯物主义，其诗学思想在认识性质上逻辑地也“接近”唯物主义。如果这一推论是合理的，则霍、叶关于《原诗》诗学思想性质的论断和郭绍虞的“主客统一”的描述根本不同。一则以为是“接近”唯物主义，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是根本，只是《原诗》中贯彻得不

彻底，接近王充以来元气自然论思想；一则以为是主客统一，两者均不可分离，在理论性质上接近客观唯心论，在中国哲学中接近程朱理学“心与理一”的命题。他们的论断之不同颇有意味。

到90年代，研究趋于复杂。部分学者沿袭着霍、叶论断的同时，又力图有新的突破，重视审美主体不可缺少的本体地位。如敏泽先生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》就可作为代表。他认为，叶燮的美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，“美本乎天地”，美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，但它并不能离开审美主体的人的发现，而人的神明才慧也终究是一种客观存在，审美感受人人具备[4](P117)。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归纳为在物者，以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为根本，在我者以“才”、“识”、“胆”、“力”为依据。两者是相互作用的。[4](P1130)敏泽先生肯定《原诗》的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的根本，但又在创作论中，肯定“才”、“识”、“胆”、“力”的“依据”地位。他想继承霍、叶的论点，又想吸收郭绍虞先生的看法，不免有照顾不到之处。庄严、章铸先生著《中国诗歌美学史》则将郭说与霍、叶说的矛盾完全突出起来。庄严、章铸先生这样写道，在叶燮看来，“在物之三”(理、事、情)与“在我之四”(才、识、胆、力)相互作用与对立统一，才是诗歌艺术的真正本源。[7](P286)这是肯定郭说，但翻过几页，又断言叶燮认为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是诗歌艺术本源，是“正确观点”[7](P291)。此说又为霍、叶所主。这反映出90年代部分学者研究《原诗》时，徘徊于郭氏与霍、叶之间的思想困境，呈现出这些学者研究成果的过渡性。到90年代后期，这种窘境稍有改观。

陈良运先生认为，《原诗》诗学本体和诗的审美创造的论述发挥了整体性认识。诗是人的精神领域内的创造活动，“源于物”又“本于心”，是心与物、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向对方转化的情感运动和审美运动。叶燮就是从主客体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揭示诗歌的本质，建构诗学本体和审美创造的理论体系的[8](P286)。陈长义先生认为《原诗》属理性美学观，叶燮正是从诗歌本体论的高度批判了前后七子与公安、竟陵的失误。“本”是什么？这就是客观事物的“理、事、情”，创作主体方面的“才、识、胆、力”[9](P49、50)，所论与郭绍虞先生“本”的论述一致。他们的看法带有向第一阶段本体论的研究回归的色彩，但也有不同，郭氏讲主客统一，重在结构的分析，系统形式的描述，以清晰见长，二陈肯定郭氏结构描述，但更重主客统一中相互作用的历程，以综合、抽象擅胜。

诗本体中的“历程”因素源于何处?回观霍、叶的“唯物”说,其中讲到了“美学”思想的辩证法因素。辩证法,真正说来,在黑格尔那里就是精神历史方法。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的辩证法,指的就是诗本体运动历程的抽象形式。陈说既讲郭说结构,又讲“历程”,则此“历程”从学术渊源说,可能源于霍、叶说。可惜的是,陈说虽讲历程,而不言辩证法,则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程,就可能流于不清晰的“绵延式”生命美学去了。这一点,值得学界注意。

综上所述,半个多世纪以来,关于《原诗》诗本体论究竟是什么,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看法,即郭绍虞先生的主客结合论、霍松林和叶朗先生为代表的(接近)唯物主义论,陈良运等为代表的主客相互作用过程论。何以会如此?问题可能在于,《原诗》对诗本体的论述本就有含混不清之处,学者们有可能只注意到自己关心的方面而得出不同的结论。学者们用以研究《原诗》的指导思想也不能说对此分歧没有起激化作用。重视逻辑分析的郭先生看出《原诗》的诗学思想结构、唯物主义的霍、叶先生则看出了《原诗》唯物主义思想成分,有广义生命哲学色彩的学者又可以看出《原诗》的主客相互作用历程的意思来,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有必要对我们研究《原诗》的指导思想进行深刻反思,同时对《原诗》的语言学的意义予以关注,使两者在相应的范围内运动,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《原诗》的诗学思想。

从思想史的背景看,明清实学在诗本体问题上批判心学,以气学为主,同时在逻辑上又有向理学转化的迹象。它兼有气学和理学成分在内,或者说处于气学向理学转化的过渡阶段。在其深远影响下,清初诗坛反思明诗而“祧唐祧宋”。《原诗》在诗本论上重视“理、事、情”与“气”的关系,其所论也接近于朱熹的理气不离,理先气后说[10](P21~22)。如此,则《原诗》诗本论或可说近乎程朱理学。就郭说与霍、叶说对比而论,郭说更接近于实。霍说“接近唯物者”,“克肖自然,表现天地万物之‘理、事、情’之语”是关键,以此讲艺术本源是在自然。但叶燮的“自然”也许就是他所谓的“理、事、情”与“气”的统一,在此统一体中,“理、事、情”为根本。如此,“克肖自然”说,也可以是程朱派“文以载道”的意思。叶朗先生断言《原诗》是十分鲜明的唯物主义艺术本源论。他认为叶燮以“气”为宇宙本体,气之流动就有了“理、事、情”[6](P488)。其实就《原诗》中气与理、事、情关系的论述看,理、事、情为万物根本,气则“总而持之,条而贯之”,“鼓行于其间”,至多如朱子所讲的“气”,起载理

以行的载体作用,不能说是本体。且“气”可尽可断,而“理、事、情”却并不随气而尽而断[10](P21~22)。如此说“理、事、情”较“气”更根本,不因气之存在而存在,叶燮之“理”地位一如朱熹的“天理”,只是更具体些,包含了情、事在内,可以说是“理”的实学化。正如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卷6所言:“叶燮接受了理学家所谓‘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’(程颐语)和‘格物穷理’(朱熹语)思想的影响,以为理是恒定的,它统摄万物,而成为万物的内核。……这样就把‘理’、‘事’、‘情’这些强调创作中客观存在、带有唯物性质的因素纳入了儒家传统的‘原道’、‘征圣’、‘宗经’的原则中去了,而且更多地带上了理性的先验的色彩了。”尽管如此,叶燮对这一思想的论述仍是隐晦的,含混的。

### 三、其他几个问题

在《原诗》反儒家与回归儒家的问题上,学者们泾渭分明。朱东润、郭绍虞两位先生没有明确论述,霍松林先生认为叶燮《原诗》“迂回”地反儒家诗教,叶朗先生认为是对封建诗学的教条主义展开了猛烈攻击[6](P527)。敏泽先生承认社会观上叶燮是反儒的,而在诗论上则是以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为旨归[4](P1116、1114),张少康、陈良运、王运熙、顾运生诸先生则认为,叶燮发展了儒家的“诗教”,是向儒家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传统之回归[11](P317),“温柔敦厚”与“雅”接近,是诗歌永恒不变的本质[12](P282~283)。笔者猜测,霍先生强调的也许是《原诗》思想的革命性成分,而后来诸先生所强调的则是《原诗》诗学思想的创造性、建设性成就。这两个方面是可以统一的。

关于《原诗》的诗学思想方法问题的阐释,也带有明显的阶段性。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其原因之一。郭绍虞先生认为《原诗》能自成一家,“即在于用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以批评文学”[3](P492)。这里所说的文学史方法非思想方法,乃批评方法。不过批评方法也蕴含思想方法。批评的方法有历史的成分,其思想方法也必有历史的成分。但这种历史的诗学思想方法,郭先生并没有自觉地揭示出来,他重点揭示的是《原诗》诗学逻辑结构,似乎叶燮本人就有逻辑分析方法成分在内。七、八十年代学者大多认为叶燮《原诗》思想方法主要是有唯物色彩的朴素辩证法。90年代以后,一些学者重视《原诗》诗学思想方法的整体性、历史发展因素,似乎倾向于认为叶燮的思想方法属于历史方法。从对《原诗》诗学思想方法的揭

示来看,似有三种:历史方法、辩证法、逻辑分析法。究竟何者为真,三者都真,还是尚有其他方法尚待昭示?抑或三者只是20世纪学者对《原诗》诗学思想戴的“帽子”?笔者认为,叶燮《原诗》的思想方法,可能本来就是既有“有物者”、“在人者”的分析,又有二者的统一,还有历程性成分在内,是三种方法混融在一起的一种朴素诗学思想方法,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朴素辩证法。

关于《原诗》的评价,郭绍虞先生以为其“能自立门户,创辟其说”[3](P492)。叶朗先生认为《原诗》始终把艺术问题提到哲学高度来研究,“《原诗》不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,而是一部理论性和系统性很强的美学著作,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。”[6](P494、498)陈良运先生认为《原诗》重建儒家诗学体系,2000多年来儒家诗学的最高成就显示于此[8](P521)。清初诗坛面对千年诗学的积淀,唐与宋的分歧,情与理的冲突,格调性灵的对抗等,因而诗学思想带有综合倾向,成为传统诗学的终结,《原诗》应运而生,可以说叶燮顺应了历史潮流,清初不可无此一家。总的看,对《原诗》的评价越来越集中于诗学上,而且地位越来越高。

另:关于《原诗》成书时间,叶朗先生认为:“林云铭在《原诗叙》中说他在丙寅(1686)9月被叶燮请到家里看《原诗》。另一沈衍的《原诗叙》也写于丙寅10月。那么,我们可以推断,叶燮的《原诗》是在1686年,也就是他59岁定稿的。”[6](P492)陈良运先生则断言“《原诗》成于康熙二十五年(1686)”[8](P521)蒋寅先生“据现有资料,也认为《原诗》写成于康熙二十五年(1686),”但“叶燮正好六十岁”。[13](P83)王运熙、顾运生先生也是据林云铭与沈

衍的《原诗序》推断“《原诗》大约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”,但推算为公元1685年[12](P287)。敏泽先生则认为《原诗》于“康熙二十八年(1684)”,由叶燮自己在二弃草堂刊行[4](P1122)。笔者以为如按翦伯赞主编《中外历史年表》推算,“丙寅”即康熙二十五年,即1686年,故叶说为确。

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汪森.小方壶存稿[M].康熙四十六年刊本.
- [2] 四库全书总目[M].上海:古籍出版社,1985.
- [3] 郭绍虞.中国文学批评史[M].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1999.
- [4] 敏泽.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[M].长春:吉林教育出版社,1993.
- [5] 朱东润.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57.
- [6] 叶朗.中国美学史大纲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.
- [7] 庄严,章铸.中国诗歌美学史[M].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,1994.
- [8] 陈良运.中国诗学批评史[M].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5.
- [9] 陈长义.试论叶燮的理性美学观[J].上海:学术月刊,1990(1).
- [10] 叶燮.原诗·内篇下[M].霍松林校注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9.
- [11] 张少康,刘三富.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.
- [12] 王运熙,顾运生.中国文学批评通史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.
- [13] 蒋寅.叶燮的文学史观[J].北京:文学遗产,2001,(6).

[责任编辑 刘欢]

##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Ye Xie's Poetics Thought of *On Poems*

NAN Hua

(College of Literature, Northwest University, Xi'an 710069, China)

**Abstract:** During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, the research on poetics thought of *On Poems* written by Ye Xie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: the early Qing Dynasty, the Republic of China, the 1960s and 1970s, and the period from 1980s till now. Great advances have been made, bu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. Scholars, for example, cannot agree on the theory nature of the poetics ontology of *On Poems*, its position in history, the time of being published, and whether it being against Confucianism or not. All thes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.

**Key words:** poetics; poetics thought; ontology of poetry